

# 文化认同： 促进中蒙合作与发展的关键

王 浩

[摘要] 目前中国与蒙古国的双边合作总体发展顺利,但仍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要应对文化多样性的挑战。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与蒙古国的双边合作水平,必须充分认识并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通过文化认同的成功运用消除双方合作的各种障碍,解决好跨境民族之间的共享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的中蒙合作环境。

[关键词] 文化认同;中国;蒙古国;合作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3-7411.2011.03.016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1)03-0117-(8)

[收稿日期] 2010-11-26

[基金项目] 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GJ11)

[作者简介] 王浩(1969—)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 一、中蒙合作与发展的现状

200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两国政府隆重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中蒙双方均力图以建交60周年为契机,在全面总结两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两国的合作与发展水平。因此,2009年成为见证中蒙两国关系的重要年份。然而,在之后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蒙古国公民与当地中国人之间的纠纷与冲突不断发生,蒙古国民间反华的情绪不断高涨,旅蒙华侨华人的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受到威胁,2010年成为近些年来蒙古国非官方反华最为严重的一年。究其原因,文化认同的不恰当运用,或者说文化认同的不被运用,成为中蒙关系向纵深发展的阻力和障碍。

自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94年4月两国重新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到200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蒙,双方宣布建立和发展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近些年来,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加深,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人文领域的交流也日趋活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看法,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配合。目前,中蒙两国关系进入了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合作的新阶段,被称之为中蒙关系的“黄金”时期。

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两国积极探索发掘务实合作的新领域、新途径。2008年6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蒙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达成“把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领域”的共识,标志着中国与蒙古的合作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充分发挥两国经济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合作,同时将合作范围扩大到能源、金融、通讯、环保、旅游、科技等领域,进一步丰富合作形式、改善合作环境、完善合作机制,将双边合作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是新时期中蒙合作与发展的总体目标。中蒙两国高层一致认为,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是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向之一。

蒙古国拥有丰富的煤、石油、铜、铀和其他稀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储量情况大致如下:石油保存量在30~60亿桶之间,与中国接壤的东、南、西部地区是石油储量丰富地带;煤矿已探明几百处,储量在500~1520亿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塔温陶勒盖煤矿,焦煤储量约为70亿吨,位于南戈壁省境内,是亚洲最大的煤矿之一;另外,南戈壁省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可开采3.02亿吨铜,1000吨黄金,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铜金矿之一。铀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核能源。蒙古国铀矿资源丰富,是铀供应大国,现有6个铀矿,已探明的储量可达10万吨,预计总量达130万吨,排在美国、哈萨克斯坦和南非之后居世界第四位。蒙古额尔登特铜铀矿也已经列入世界十大铜铀矿之一,储量居亚洲之首。蒙古国现已探明的有80多种矿产,6000多个矿点,蕴藏量约500亿吨以上,目前有十多种矿种的约500个矿床已被评估,约150个矿床被开采,而绝大部分还有待开发。其中铜、磷、萤石、煤、石膏的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开采潜力巨大。在蒙古国投资开发矿产资源,中国有其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中蒙两国地理相连,文化相通,经济互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蒙古经济增长创造了重要机遇。蒙古国出口矿产资源最近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中国不仅可以为蒙古提供先进设备及技术,还能投入大量资金。中国连续10余年保持蒙古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蒙古实行市场经济机制以来,经济不断恢复,近年来发展迅速,蒙古的发展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中蒙矿产资源的合作与开发,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对于中蒙两国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来说具有极为突出的重要意义。<sup>[1]</sup>

《2008~2021年蒙古国家综合发展战略》提出,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加储蓄,确保经济高效快速增长,发展现代加工业,发展有效经济外交,是蒙古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领域。<sup>[2]</sup>在蒙古国的发展中,矿产业领域占首要地位。提高该领域的经济效益、金融能力、对引进国内外投资实行妥善政策从而改善资金盈利是蒙古国矿产业的目标之一。蒙古国政府采取鼓励可再生能源、燃料更深加工技术的措施。自2008年始,开拓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领域将会成为蒙古国长期稳定国家财政的来源。<sup>[3]</sup>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能源供给的保障成为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互利共赢是中国坚持的一贯方针。显然,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双赢是中蒙两国经济合作的目标。

## 二、提升中蒙合作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两国经贸合作与两国拟定的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着一定差距。据蒙方统计,自1990年以来,截至2010年9月30日,在蒙古累计注册登记的外国企业公司共计10491家,直接投资总额40.65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公司5205家,直接投资金额23.28亿美元,分别占注册企业数量和投资金额的49.61%和57.28%。在投资领域,中蒙双方企业在矿产开发、石油勘探、餐饮服务、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日益密切,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据蒙方统计,中国对蒙投资项目已超过4000项,中国已连续13年保持蒙古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

中国在蒙古投资企业数量最多的是外贸餐饮行业,占64%;投资金额最多的是矿产开发领域,占60%。而投资企业数量最少的是矿产开发,占3.5%;投资金额最少的是建筑建材,占1.8%。从企业数量上来看,目前中蒙合作主要集中在外贸、餐饮等领域。就矿产开发而言,中国在蒙古投资金额比重较大,而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正在蒙古国投资经营的国际大型公司名单中鲜见中国大型公司。究其缘由,能源地缘政治战略是各国关注蒙古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对能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能源价格攀升,各国也日益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思考本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凭借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和独特战略位置,蒙古国受到世界大国的特别关注。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蒙古国,

继“能源新大陆”——中亚地区之后，逐渐成为全球各经济强国争夺资源的一块新阵地。而对于世界大国来说，在地缘与资源结合的蒙古，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利益，而是更加看重蒙古的战略地位。同时，蒙古国利用资源在各大投资国之间寻求平衡，也并非纯粹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关储量丰富的两大战略矿<sup>①</sup>奥尤陶勒盖铜矿<sup>②</sup>和塔本陶勒盖煤矿<sup>③</sup>开采问题的讨论延续十余年，能源战略安全成为蒙古国举棋不定的首要因素。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文化认同也是进一步提升中蒙合作关系水平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9年9月30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2010年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22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了蒙古民族的喉音演唱艺术——呼麦。呼麦是蒙古民族一种喉音演唱艺术，歌手纯粹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声带发出的是低沉的基音，而口腔发出的是高亮的泛音，加上气息的调控，口腔共鸣点的变化就可在高音部形成旋律，形成人类歌唱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多声部形态。呼麦主要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草原和呼和浩特等地以及新疆的阿尔泰山一带的蒙古族居住地；蒙古国的西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蒙古族聚居地区，是跨越中、蒙、俄三国的一种神奇的歌唱艺术。出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程序和条款的不甚了解，蒙古国政府及民众将中国政府的呼麦申遗成功的危害无限放大，扩大到威胁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蒙古国政府于2010年1月20日，召开了申报世界遗产通报会，强调要加强保护文化遗产的力度，并致信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称呼麦来源于蒙古西部阿尔泰地区，是蒙古国的文化遗产，不期望以外国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sup>[4]</sup>蒙古国各大媒体从“呼麦申遗”到“蒙古袍申遗”、“蒙古民族舞、贝尔格舞申遗”、“蒙古古诗申遗”，从“成吉思汗是谁的民族英雄”到“《蒙古秘史》的归属问题”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sup>[5]</sup>蒙古网络大加渲染，网民丑化中国人形象的言论触目皆是，中国人被描述成具有威胁性的“文化掠夺者”。“呼麦申遗事件”虽未构成冲突，但“呼麦申遗事件”将蒙古国非官方反华情绪推向顶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蒙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和谐氛围，助长了部分蒙古人对在蒙华人的不满和不信任，妨碍了中蒙之间正常的合作与发展。究其因由，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 1. 蒙古国国民的本民族文化心理认同感强烈，担忧被异质文化所同化

外蒙古自治和蒙古国独立不足百年，摆脱前苏联的“卫星国”、“加盟国”地位不足20年，自身人口数量及经济规模相比较而言相对弱小，使得其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十分强烈。蒙古人居于自然条件恶劣的蒙古高原，夹于中俄两个大国之间、无出海口的地理环境中，且中俄两国都是拥有各自独特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文化大国，加之蒙古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因此易于形成很强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心理。他们一方面渴求与外国交往，吸收别国先进文化，融入世界，加速现代化步伐；另一方面又十分敏感，担心在对外文化交往过程中丧失自我，完全被异质文化同化。

2. 蒙古国政府将保护传统文化提升到保护国家安全独立的层面，试图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现其对独立、自主的诉求

蒙古国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实行了文字斯拉夫化并延续至今，在意识形态上曾经与盟友前苏联保持高度一致70余载，传统文化曾受过极大的冲击。尽管如此，但90年代末期以来，蒙古国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恢复工作，文化传承得以延续。

① 2006年7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矿产资源法》将塔温陶勒盖、奥尤陶勒盖确定为战略矿。

② 该矿的主要投资者是澳大利亚力拓（Rio Tinto）集团与加拿大艾芬豪（Ivanhoe Mines）公司。目前正在建设该矿开采的各项基础设施。

③ 蒙古国正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标该煤矿的开采。意向投资者名单中至少包括了中国神华、俄罗斯基本元素（Basic Elements）和列诺瓦（Lenovo）联合财团、哈萨克斯坦、印度金达尔（Jindal）、日本三井（Mitsui）、伊腾忠（Itochu）、丸红（Marubeni）、住友（Sumitomo）财团、美国皮博迪能源（Peabody Energy）、澳大利亚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公司、加拿大等20多家国际知名公司。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蒙古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全盘西化,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文化方面日趋西化、自由化,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经济的持续低迷,朝野党派的不断纷争,政治风波的此起彼伏,使蒙古政府无暇顾及保护和发展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1996年颁布了《蒙古国政府文化政策》,该政策首次正式地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提升到保护国家安全与独立的层面。其后,蒙古国政府在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字、历史、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等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试图恢复传统蒙古文(畏兀儿蒙古文)、确立佛教在蒙古的国教地位、召开“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40年大会”等等,力图依赖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确保其文化统一、国家独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蒙古国政府基于国家独立与安全考虑,积极推行蒙古国的传统文化才是蒙古民族文化主体的政策,试图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现其对独立、自主的诉求的意图日趋明显。2010年,蒙古国大呼拉尔第四十八号决议通过了《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sup>[6]</sup>明确地将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构想”之中。在“总纲”第一部分“国家安全”的第六款是这样表述的:“保存、保护和发扬民族历史、语言、文化、遗产、传统、风俗是蒙古民族存在的基础,至关重要。”<sup>[7](1483)</sup>《安全构想》将文化安全列入国家安全组成部分,提升到蒙古国生存安全的层面。为了保护蒙古历史、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安全构想》特别强调了由国家提供支持,尤其鼓励图书、教科书、电影艺术创作,保护和弘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构想》对于加强蒙古民族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强蒙古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狭隘认识,对于蒙古民族历史的片面解读,导致了蒙古国的地方根源意识格外强烈

蒙古国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还有着较大的局限。他们的媒体报道中总是片面地将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族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意识到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其各民族在自身发展与相互融合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而多样性的优秀传统文化。

自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于政治和国家安全考虑,蒙古政界和学界一直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自古以来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各个民族是有传承性的;蒙古民族自始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贯通东西的蒙古帝国,15世纪庞大的帝国分裂成为诸多小汗国;17世纪至19世纪蒙古民族处于清朝的殖民统治之下;1921年的人民革命则被视为一场民族解放运动。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蒙古历史更是被视为“内受封建压迫,外受殖民统治的最艰难时期”的200年。2011年蒙古国拟将大规模庆祝“摆脱清朝统治一百周年”。从2009年起,蒙古国家电视台每天播放一期节目介绍这段历史。经过90余年的建构和强化,这种历史观念已经深入蒙古国民众内心,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不了解历史的全貌。

同时,这种被歪曲的历史观念必然会导致强烈的地方认同意愿和地方根源意识。事实上,从2006年在蒙古国举办的一系列、规模不等的“庆祝蒙古帝国建立8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就可见端倪。在新近颁布的《安全构想》中也传递出这种强烈的地方根源意识。《安全构想》的“国家安全组成部分及实现途径”第一条“生存安全”的第四款“文化安全”中写道:“在乌兰巴托建立世界蒙古研究中心,吸引蒙古学家参与研究工作,在其他国家建立分支机构。”<sup>[7](1486)</sup>蒙古国试图通过建立世界蒙古学研究中心并在其他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的途径,向世界表明蒙古国才是蒙古学研究的中心所在。蒙古学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我国,按照学科划分,被列入民族学的范畴。对于蒙古国而言,蒙古学是他们的国学,重视蒙古学研究无可厚非。但是,倘若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藩篱,过于强调地方根源意识的话,那么文化认同就会变成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引起双方的误解就在所难免了。

#### 4 全球化进一步激发了蒙古国强烈的保护自身文化的意识

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性进一步激发了蒙古国对自身文化的保护意识。蒙古国一方面渴求全球化为它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又担忧全球化对于蒙古本民族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威胁。蒙古国前总统那·恩赫巴雅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谈到全球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他说:“蒙古是个小国,但有自身丰富的文化、语言、传统和历史,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保护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对我们十分重要。不久的将来,全球化的世界将面临偏远地区的人类文明及其独特文化消亡的威胁。在蒙古,某些外国文化的持续入侵正引起不安和关注,从长远角度讲这将威胁我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事实上全球化的文化压力已经渗入到传统价值观,如家庭价值领域中。”<sup>[8]</sup>全球化的压力加强了蒙古国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高度关注。文化遗产是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标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反映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在日趋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蒙古国对于自身文化的统一性越发敏感,将文化遗产视为蒙古民族生存的根本,一旦失去或面临失去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之后,大众的这种敏感就会变得越发强烈,从而引发争端与摩擦。

### 三、提升双方务实合作的思考

为了推动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顺利发展,使中蒙的合作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必须解决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 1. 确立多元文化观

多元文化观又称为现代文化观或文化多元主义,萌芽于18世纪初期;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并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则在20世纪下半叶。多元文化观念强调文化多元包容,提倡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各种文化价值的理念。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坚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并使之成为国际社会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举措。保护非物质遗产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战略手段。

多元文化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各种文化都有平等的价值,有多元表达的权利。以多元文化观来看待问题,要宽容、包容和承认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赞赏和学习各种文化的长处,最终达到更大的人类文化融合。确立多元文化观是增进双方相互认同,达到文化理解,促进信任,巩固和提升中蒙合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中蒙两国应通过相关政策、教育、社会舆论宣传,使尊重文化多样性成为两国民众的一种共识。在两国交往中自觉不自觉地遵从多元文化原则,淡化文化接受过程中的异己感和排他性。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中蒙双方要相互尊重和承认对方文化的独特性和平等价值,不能固守僵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12月17日通过的《人权与文化多元性》决议中所指出:“每种文化都有值得尊重和保存的尊严和价值,并深信在其丰富多元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方面,所有文化都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sup>[9]</sup>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人心,重视文化的全人类性和世界性也正在逐步达成共识。无论长调、呼麦,还是贝尔格舞、蒙古袍,无论是蒙古国的,还是中国内蒙古的,抑或是俄罗斯的,都是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遗产,都有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價值。被世界音乐界誉为“天籁之音”的呼麦,不仅是蒙古民族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但首先还是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蒙古国、俄罗斯、中国都应当根据自己国家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抢救、保护和传承呼麦的法律、政策和措施,科学、全面、系统地抢救和保护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有利于弘扬蒙古民族文化,对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在相互尊重和承认对方文化的独特性和平等价值的前提下,2010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和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部部长奥特根巴雅尔在三亚进行了会晤,双方签订了“关于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开展合作达成共识。2010年11月18日，蒙古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2010年蒙古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蒙古的那达慕”、“蒙古的喉音演唱艺术呼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蒙古国文化部长奥特根巴雅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那达慕”及“呼麦”成功申遗是中蒙三亚会谈所取得的成果。<sup>[10]</sup>

2 构建和推广涵盖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和形态，加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多重性内涵的对外宣传工作

从蒙古媒体网络有关“呼麦申遗”报道中，不难看出，蒙古人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还有着很大的局限。他们片面地将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族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各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而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既是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同一性文化，又是一个包容了多民族文化特性的多样性文化，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即是呈现“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应逐步改造现行的某些话语体系，丰富和充实中华文化的内容形式，形成多重的中华文化概念和形态，加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多重性内涵的对外宣传工作，努力地改变国外对于中华文化概念的片面和狭隘的认识。

本着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扩大及推进两国人文和文化合作与交流的意愿，中蒙两国于2010年5月1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议》。文化中心旨在通过设立图书馆、阅览室、电影放映室等设施为对象国提供本国相关文化资料；通过举办演讲、演出、展览、讲座和研讨会等活动增加双方的文化交流。2010年6月2日，正在蒙古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参观位于乌兰巴托的中国文化中心，与蒙古国副总理恩赫巴勒德为文化中心揭牌。无疑，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的建立与运行一定会为促进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增进蒙古人民对于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多重性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一个积极有益的平台。

3 发挥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为中蒙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化，生活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在各自文化的影响下，在语言、宗教信仰、习俗等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身文化的普遍认同。

全球化在增进人类交往的同时似乎消解了所有特殊的文化认同，而这种消解本身恰恰又导致普遍的认同危机与文化焦虑，从而酝酿着文明冲突的危险。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说，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成为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sup>[11]</sup> 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受到其冷战思维的局限，夸大了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没有意识到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冲突，还有交流与融合。然而冷战后的实践证明，如果各国处理不当，“文明的冲突”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的身份认同这个发端于文化研究领域的概念正在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预防文明冲突，增进文明对话的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个民族、族群、社区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群体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问题上，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到跨境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敏感性。倘若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不同程度地激起感情上的恶感，甚至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今后的合作中，中蒙双方必须充分认识并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通过文化认同的成功运用沟通感情，增信释疑，逐渐消除双方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障碍，解决好跨境民族之间的文化建设，卓有成效地构建和谐的中蒙合作环境。文化认同的成功运用是中蒙和谐关系得以发展，进一步提升中蒙合作与发展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蒙两国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文化认同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新近签订的“2010~2013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协议中,明确写明“……鼓励联合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科研会议,以及与之有关的表演和展览”及“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互访,开展历史文物保护、修复及考古、博物馆专家的交流,并发展在此领域的合作”等条款。<sup>①</sup>相信中蒙两国政府依照该执行计划,尊重彼此的文化认同权,鼓励及支持两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共同研究和探讨跨境民族之间的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定能够消除双方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增进信任,加强了解,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中蒙合作环境。

#### 4 加强中蒙双方的共享文化建设

蒙古民族跨境而居,主要居住在蒙古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境内。他们拥有着悠久的、具有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跨境民族因素对于中蒙合作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就积极的层面而言,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地区有着相似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环境,在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上有着亲缘关系。倘若中蒙双方把蒙古国与内蒙古相似的文化传统作为纽带,以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为基础,加强共享文化建设,就可以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整合,化解疑虑,降低误解度,增进相互信任和对彼此之间分歧的宽容,从而在不断扩大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其在中蒙合作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中蒙双方逐渐认识到加强共享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2005年,中蒙两国联合成功申办“蒙古族长调民歌”为联合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制定了保护实施计划。该计划2008年已开始实施。中蒙双方基于合作的现实要求和共同利益联手申遗,保护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又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同利益的整合,也利于共享双方的文化建设,实现了互利共赢,成为成功实施文化认同的范例。

2010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部签订了“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谅解备忘录”,就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开展合作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建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机制,就双方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进行协调和沟通;双方将分别成立副部长级合作机制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双方开展合作工作。2010年5月1日,为了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巩固和深化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签订2010~2013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其中第九条:“双方对于对方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组织提出的提案给予适当的支持。”

此外,借重内蒙古与蒙古的历史关系,发挥内蒙古与蒙古语言相通、道德观念及文化认同大致上相似的优势,更多地让内蒙古参与对蒙古的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可以在蒙古国设立内蒙古文化中心,充分发挥内蒙古在中蒙关系上所起的桥梁作用。

#### 5 坚持“和而不同”理念及“外来文化本土化”原则,平等对话,共建和谐的合作环境

如同一些学者提出,多元社会中各种文化及其认同共存需要一个普遍原则来维系,对待中蒙关系上也要尊重一些共同的标准和行为规范,即遵从“和而不同”和“外来文化本土化”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出自于《论语·子路》的“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和而不同”认为世上万物各有不同,但绝对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主要内涵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产生新的事物,这一事物又与其他事物构成新的不同。“和而不同”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sup>[12]</sup>“和而不同”以简约的形式高度地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的共生理念,同样对于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不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建构一种全球共生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蒙古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历来有“外来文化蒙古本土化”的传统,即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

<sup>①</sup>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2010~2013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第四条及第六条。

化传统对外来文化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把外来文化转化并纳入自身文化系统之内,而被本土文化所过滤后的外来文化才能对蒙古文化发生作用,成为蒙古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原动力。“外来文化本土化”原则,力图通过本土化来实现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结合,对于在目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浪潮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民族化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无论是“和而不同”理念,还是“外来文化本土化”原则,都旨在探索人类如何促进多元共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如何促进和谐共处的问题,是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的重要基础。倘若中蒙两国在今后的合作中能够坚持上述两项原则,定能够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拓宽各种沟通的途径,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在互相认同中共创和谐世界。

总之,文化认同的成功运用是中蒙和谐关系得以发展,进一步提升中蒙两国发展与合作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在对待中蒙两国关系上,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到跨境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敏感性。倘若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会激起感情上的恶感,甚至影响两国关系。中蒙双方应该在“和而不同”及“外来文化本土化”理念下,充分认识并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通过文化认同的成功运用消除双方合作中的各种障碍,增信释疑,解决好跨境民族之间的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的中蒙合作环境。

### 参考文献

- [ 1 ] 曹海波. 中蒙合作面临良好历史机遇[ M]. 东北亚论坛, 2009 ( 1): 78—83
- [ 2 ] [蒙]蒙古 2008~2021年国家综合发展战略[ M]. 乌兰巴托, 2008: 21.
- [ 3 ] <http://www.iltod.gov.mn/UserFiles/Books/Budget%202008-4.Pdf>
- [ 4 ] [蒙]参见蒙古国《真理报》2010-01-02、《民主报》(2010-01-06)、《今日报》(2009-01-23)、《世纪报》(2010-01-21)、《日报》(2010-01-21).
- [ 5 ] [http://news.google.mn/?66172\\_61818\\_65727\\_65705\\_65254...](http://news.google.mn/?66172_61818_65727_65705_65254...)
- [ 6 ] 以下简称《安全构想》。<http://www.nsc.gov.mn/?q=node/119>
- [ 7 ] [蒙]蒙古国大呼拉尔办公厅. 国家公报[ J]. 2010-09-27 第 36号, 总第 657号: 1483-1486
- [ 8 ] 林建华. 余音绕园——外国政要北大讲演录(1998~2008)[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43
- [ 9 ]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ciples/ga/54/doc/54160.htm>
- [ 10 ] <http://www.mongolnews.mn/?12990>
- [ 11 ]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29.
- [ 12 ] 乐黛云.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63—64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Culture Identity: The Key to the Promotion of Sino-Mongolia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ANG Hao

Abstract: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which have developed smoothly on the whole now still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diversity.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Sino-Mongolia bilateral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realize and play the function of culture identity so as to win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ies,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sharing culture constru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Mongolian People and build harmonious Sino-Mongolia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culture identity, China, Mongolia,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